

唐修《晋书》取材《世说》的是非得失

王澧华

(上海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 唐修《晋书》取材《世说》,一直为人诟病。其立论标准,分别基于史料采集与史传编著两个视角。但是,就前者而言,唐修《晋书》取材《世说》,恰恰不是“做错”而是“做对”了;就后者而言,它却是做得“不够”、“不好”。究其原因,在于“詮次旧闻”有余,“裁成义类”不足,因而见事不见人,有史而无传。作为“史家极则”,“传以志人”,必须传人传神,唐修《晋书》取材《世说》,以其成功与不足,为后世留下了双重的借鉴。

关键词: 唐修《晋书》;《世说新语》;是非得失;双重原则;双向审视

本文选取“唐修《晋书》取材《世说》”这个一直为人诟病的事例,结合史料采集与史传编著的双重原则,双向审视其是非得失,从而加深对古代史传批评理论的认识,对其所批评的对象并且包括批评理论本身,作出一个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的重新评价。

一、取材之多,令人咋舌

唐修《晋书》大量取材于《世说新语》,自唐人刘知几以下,多有讥刺。查阅台湾学者王国良先生《六朝小说与〈晋书〉之关系初探》一文,据称,唐修《晋书》采录《世说》,竟至350则^[1],这确实多得惊人了。至于其如何取材,此文亦有明细的分类。

一是原文照录: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世说新语·德行》

第32条)

(阮裕)在剡,曾有好车,借无不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后裕闻之,乃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命焚之。(《晋书·阮裕传》)

二是稍加增删:

初,荧惑入太微,寻度海西。简文登祚,复入太微,帝恶之。时郗超为中书,在直,引超入曰:“天命修短,故非所计,政当无复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马方将外固封疆,内镇社稷,必无若斯之虑。臣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诵庾仲初诗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声甚凄厉。郗受假还东,帝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于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卫,思患预防。愧叹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世说新语·言语》第59条)

先是,荧惑入太微,寻而海西废;及帝登祚,荧惑又入太微,帝甚恶焉。时中

收稿日期:2004-06-20

作者简介:王澧华(1961-),男,湖南澧县人,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献整理研究。

书郎郝超在直,帝乃引起入,谓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计,故当无复前日事邪?”超曰:“大司马臣温方内固社稷,外恢经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请急省其父,帝谓之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于此!由身不能以道匡卫,思患豫防。愧叹之深,言何能喻?”因永虔闻诗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晋书·简文帝纪》)

三是多为更易:

庾稚恭为荆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刘劭曰:“柏梁云构,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钟、夔先听其音。稚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后闻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世说新语·言语》第53条)

(庾)怿尝以白羽扇献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刘劭曰:“柏梁云构,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钟、夔先听其音。稚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后怿闻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晋书·庾怿传》)

可见,证据确凿,取材之迹,显而易见。

二、是非与得失

1. 从史料采撰的原则来说,唐修《晋书》取材《世说》,不是“做错”了,而是“做对”了

博采异闻,一直是历代史学家的纂记目标,同时也是史家公认而且代代相传的记载方式。刘知几在《史通·古今正史》一篇中,自《尚书》而至《史记》、《汉书》,一一列举,充分肯定其“撰诸异同”、“讨论众书”的编撰体例,而且还对唐修《晋书》作有近似于正面评价的论述,称“皇家贞观中”,“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可见,唐修《晋书》“采正典与杂说”,大体是遵循着“古今正史”的采撰传统与原则的。

可是,刘知几却又在同一部《史通》的《采撰》篇中,在列举《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后,对唐修《晋书》公开指责:“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宝,作《晋纪》)、邓

(粲,作《晋纪》)之所粪除,王(隐,有《晋书》)、虞(预,有《晋书》)之糠粃,持为逸史,用补前传。”唐修《晋书》既然是以当时尚存的“前后晋史”“更加纂录”,则无疑已经“采正典”;至于所采“杂说数十部”,是否就一定是“粪除”与“糠粃”?同一个刘知几,在同一部书的《杂述》篇中,却又亲口说过“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可“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可是,他最终还是认为,“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既要独断于雅正,折衷于夫子,于是终究还是要陷入到“君子”、“小人”的自我封闭之中。

说到底,《晋书》究竟为何而作?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已经明确无误地指出唐诸家《晋书》“才非良史,事亏实录”,“其文既野,其事罕传,遂使典午清高,韬遗芳于简册;金行曩志,阙继美于骊驎。遐想寂寥,深为叹息”。^[2]也就是说,唐太宗心目中的《晋书》,似乎是要“实录”典午一朝的“清高”与“遗芳”,其文不能野,其事不能“罕传”,这才下令“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试想,记录典午一朝之“清高”与“遗芳”,其文不野,其事盛传,并且恰好是“铨次旧闻,裁成义类”的,舍刘义庆《世说新语》外,还能有谁?刘应登《世说新语序》曾说:《世说》主要是“为晋作,及于汉魏者,其余耳”,“清微简远,居然玄胜”,“有味有情,嚙之愈多,嚼之不见”。^[3](1931)试想,舍此着意采撷佳事佳话的旧闻大观,唐代史官将何从“实录”典午一朝的“清高”与“遗芳”呢?唐太宗在表示“遐想寂寥,深为叹息”之后,谕令史臣“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现在看来,“诰”字无从落实,湮落之“语”倒是大加涂次,“咸使发明”了。

那么,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刘知几斥之曰“粪除”、“糠粃”,说它只能“取说于小人”,终将“见嗤于君子”,因为它们“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之也。”(《史通·书事》)在他看来,“夫以刍蕘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现在看来,正是这个“记功书过、彰善瘅恶”的道德评判,背离甚至是压制了“讨论众书”、“撰诸异同”的基本原则,历史“应该”怎样,取代了历史“本来”怎样。“实录”与“良史”的逻辑关系,便被封建正统史学观念人为地颠倒了。原则既被颠覆,是非也就随之

颠覆了,得失也就随之混淆了。

2. 从史传编著的角度来看,唐修《晋书》取材《世说》,却又反倒是做得“不够”,做得“不好”,至少是做得“不够好”

史料采撰只是手段,目的还是史传编著。《史记》全书130篇,除去十表八书,十二本纪述帝王,三十世家总诸侯,七十列传志卿士,为的是使历史人物“区详而易览”。刘知几将之概括为“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史通·六家》),可见,史传的中心就是人物传记。人物传记,记言记事,必其言有可采,事有可传,方可作为记传。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史传就是要传奇、传神。

作为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本着“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原则,为帝王兴废而作本纪,为诸侯存亡而作世家,为“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之人“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真实再现了一大批历史人物的卓犖经历和精神风貌。对此,梁启超归之为“史家创作”。可是,唐修《晋书》之取材《世说》,却是“大抵宏奖风流,以资谈柄”(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甚至流于为晋人在史传,不能不“宏奖风流”,但目的如果是“以资谈柄”,这就有问题了。

从总体上看,唐修《晋书》之取材《世说》,往往只是作为材料补充和轶事点缀,很少作为一种脉络的贯通,缺少来龙去脉的有机联系,很少能使人看出传主即时即刻言行举止的逻辑关系和心理活动。兹以一篇800字的《卫玠传》为例:其中,祖父之叹“年老”,见于《世说新语·识鉴》第8条,舅父之叹“珠玉”,见于《世说新语·容止》第14条,“平子绝倒”、“阿平绝倒”见于《世说新语·赏誉》第45、第51条,“看杀卫玠”见于《世说新语·容止》第19条,谢鲲恸哭及王导改葬见于《世说新语·伤逝》第6条,谢尚、刘惔之评见于《世说新语·品藻》第42条。唐代史臣就用《世说新语》中的这几条现成材料,极其简略敷衍出号称“江左第一”的卫玠的一生传记。相反,最能直接体现传主思辨天才的“总角问梦”(《世说新语·文学》第14条,透露传主内心情感而在永嘉渡江之际、“形神惨悴”发出的“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第32条)的浩叹,却又被一概遗落了。

100

他们可以将“阿平绝倒”之说一再叙及,但就是没有下力气去发掘传主的精神世界,展示传主在不同遭遇之下的性格特征。

究其原因,大概来自于六朝以来的尚博风气。刘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上搜旧闻,旁摭遗逸”,而且自比于“绩事以众色称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上三国志表》),宋文帝以其“鸠集传记,增广异闻”,誉为“不朽”(《宋书》本传)。唐臣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以及敬播、李义府、崔行功、李淳风等人,多次编撰古今总集、大型类书与历朝实录,诸如《文思博要》、《瑶山玉彩》、《东殿新书》、《累璧》以及《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不一而足。流波所及,习惯成自然。这就难怪刘知几要讥讽为“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了(《史通·采撰》)。确实,修史毕竟不同于注史,更不同于编辑类书,纪传体也不等于起居注。唐修《晋书》取材于《世说新语》达350条之多,但并没有真正表现出几个真实而生动的风流名士来,足见唐代史臣缺乏“史家创作”的史才与史识。

三、反思与启示

1. 权威性还需来自于真实性,真实性应该高于权威性

史料采撰是史传编著的前提。司马迁著《史记》,也正是一方面细绎石室金匮之书,另一方面,还要网罗天下放佚旧闻。《荆轲列传》之所以写得那么绘声绘色,乃是因为有秦始皇的御医夏无且“具知其事”,是他将荆轲刺秦王之事描绘给了友人公孙季公与董生,他们两人又对司马迁之父司马谈“道之如是”。此外,司马迁还一再表白:“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淮阴侯列传》),“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余与他广(樊哙之孙)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如此”(《樊哙滕灌列传》),再看书所述鸿门宴之樊哙救驾、述韩信报漂母之恩以及胯下之辱,写得那么具体入微,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自古及今,就一直有人对此耿耿于怀。“晋散骑常侍巴西谯周,以迁书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诸子,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其谬。”(《史通·古今正史》)其中

褒贬,甚为分明。此外,刘知几甚至连“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论语》旧说”也表示不满,认为是“可除而不除”,还说“以斯著述,未睹厥义。”(《史通·杂说上》)《论语》是孔子师生日常对话录,《孔子世家》采择入传,有何不可?这可真的是“以斯著述,未睹厥义”了!

事实上,那些比较正统的“儒者”之所以计较“毁誉所加,远诬千载”,是因为他们心中隔着一个“刍蕘鄙说”与“竹帛正言”的鸿沟,悬着一个《五经》、《三志》的理想(《史通·采撰》)。司马迁有志于“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以“拾遗补艺,成一家言。”(《报任安书》)而唐太宗诏修《晋书》,原本是因为怀想着典午一朝的“清高”与“遗芳”,而又不满于旧史之湮落与简陋,以至于“遐想寂寥,深为叹息”,这才要“詮次旧闻,裁成义类”,以期湮落之事,“咸使发明”。于是,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人领旨,奏取令狐德棻、敬播、李安期、李怀俨“详其条例,重加考证”,责成来济、李淳风、李延寿等十余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摭摭诸家博记而附益之,爰及晋代文集,罔不毕记。”(《册府元龟·国史部》)在这里,既有正典为本,又有博记附益,并且采集晋代文集,“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读者的选择,乃是最好的评判。

其实,六朝人自己对于这种杂语与博记,并不像后人那么轻描淡写。《世说新语》全书36门,共计1130条,刘孝标博引当时史传谱记数百种,纠举之谬,也不过百分之一,更多的则是补充与证实。例如《假谖》篇第7条,记王敦屏人谋逆,“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汗头面被褥,诈孰眠……于是得全”,刘孝标注曰:“按诸书皆云是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谬。”唐修《晋书》正是将此采入《王允之传》,于是,王敦之恶、允之之智,并得作为信史留存。

刘知几虽然表示“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可“为生作者削稿之资”,但是,骨子里仍然固守“刍蕘鄙说”与“竹帛正言”之大防。这自然影响到立论的科学性与公正。事实上,不论是“刍蕘鄙说”还是“竹帛正言”,只要真实可信,本无所谓权威性的高低。反过来说,权威性还需来自于真实性,真实性其实高于权威性。刘知几等人对唐修《晋书》取材《世说》(包括《史记》采及家人)的苛责,反倒促使后

人加深了对正史偏记相互关系的思考。

2. 史传编著应当史、传并重,不能见事不见人,有史而无传

史传二字,一是“史”,二是“传”。一方面是存史事,另一方面则是传人格。存史事可以借助于“比次之力”与“考索之功”,传人格则要求明辨善恶,并且更注重传奇与传神。

然而,唐修《晋书》之取材《世说》,多数情况下只是出于作者的好奇爱博之心。这样,两晋名士的种种遗闻轶事,多数情况下,也仅仅作为了人物列传开头结尾的花絮与点缀。兹以东晋两位风流宰相王导、谢安为例,略为论述。

清代史学家王鸣盛曾说:“《王导传》一篇,凡六千余字,殊多溢美。要之,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乃并无一事,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所谓翼戴中兴,称‘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确实,一篇6000余字的《王导传》,却真没有将这位“江左夷吾”的精神风貌写出几分来。而《世说新语》记录王导事约计50条,上至军国大政,下至家庭生活,他的为政作风、待人接物以及喜怒哀乐,都有活生生的展示。例如泪谏元帝止酒、结援吴人请婚以及玄言清谈、品藻名贤诸端,都是他人生的重要表现,但是这些都没有在唐修《晋书》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如:“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露接,人人有说色。惟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达任边,云:‘君出,临海并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阁!兰阁!’群胡同笑,四坐并欢。”(《世说新语·政事》第12条)据此,朱熹叹息道:“王导为相,只周旋人过一生。谓胡僧曰:‘兰阁!兰阁!’乃胡语之褒誉者也。”(《朱子语类》一百三十六)而陈寅恪先生则据以判断王导“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矛盾,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御外侮”之良苦用心。^{[4](P68)}又如:“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策诺之,自叹:‘人言我愤愤,后人当思此愤愤。’”(《世说新语·政事》第15条)这是展现传主精神世界的最好材料,而唐代史臣并皆弃置不用,这才叫做“虽存记注,才非良史”了。

《世说新语》记述谢安行事80余条,占全书之最,而唐修《晋书·谢安传》则不足3000字,基本上接近于一个流水账,但他作为一代名相的识鉴、雅量与气度,却没有得到着意的展示,而这在

《世说新语》中几乎随处可见：“谢公时，兵厮逋亡，多近甯南塘，下诸舫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刘义庆将之收入《政事》，一如上举王导二事，即表明了他对王、谢二相治国安邦之作风、能力与绩效的判断。此事在檀道鸾《续晋阳秋》既有详细表述，且有议论评断，谓之“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烦细，又以强寇入境，不宜动加人情”。黄老哲学主张无为而治，它几乎就是魏晋玄学的核心，东晋半壁江山，内忧外患不断，王导、谢安皆以清静镇物，保全江东，这才体现了他们作为特定历史时期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非凡韬略。再如以下两条：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导)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世说新语·文学》第22条)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安)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初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灰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世说新语·文学》第55条)

如此风流倜傥，如此引人入胜，如此不可多得，唐代史臣竟然视而不见。这也难怪，史官奉旨修史，职在鸠集众书，排比异同，“詮次旧闻”固然有余，“裁成义类”难免不足。这样的官修史传，便显得见事不见人，有史而无传了。

3. “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史传批评理论的批评与建设

史传的编著与批评，一直都受到文学理论家与史学批评家的共同关注。刘勰著《文心雕龙》，

作《史传》篇，对史传这一门类释名定义，追踪溯源，并且选文定篇，昭示典范。刘知几作《史通》，专注史法，自谓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自叙》)章学诚撰《文史通义》，出入文史，重在史意，“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家书》二)近代以来，文史学者对于古代丰富的史学理论遗产，作了大量的考释与阐明工作，同时也在不同的程度上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批评和完善。但是，总的来说，还是阐释多于批评，认同多于建设。丰富的史学遗产固然要继承，但是，任何优秀的经典名著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时代的差异总会带来历史的局限。为着学术的进步与发展，应该是质疑高于认同，创新大于阐释。

一般说来，经典名著之所以成为经典，一是实事求是的原则，二是批评的勇气，三是创新的精神。倘若以经典之是非为是非，以名家之好恶为好恶，那倒是从根本上背离了经典名家的精神实质。即如刘知几，一生酷嗜《左氏春秋》，服膺正统名教，《史通》开篇之《六家》，就对司马迁的“整齐故事”之法深致不满，认为“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安得比于《春秋》哉”。这也几乎成为他批评历代史传编著的指导思想，“其事不圣”，“其言不经”，成为他黜陟褒贬的基本标准。对此，今人肯定不能盲从。但是，他在言必《春秋》《左传》的同时，几乎是不经意地说出的“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却正好作为我们进行理论批评与理论建设的出发点。

东晋文士袁宏，既撰《后汉纪》，又作《名士传》。其《后汉纪叙》称：“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纪事而已，信足以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立言光明正大。但是，《世说新语·文学》第94条记录的一段故事，却让人看到了他并不那么庄重俨然的另一面：“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狴耳！彦伯遂以著书。’”其所传之人，乃是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以及王衍、谢鲲等中朝(西晋)名士。记载这么一帮子风流名士，难道也可以“通古今而笃名教”？是否也“信足以扶明义教，网罗治体”？

这也许是“时移世异,体式不同”的最好注脚。

史传之初起,也许是“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但是,“时移世异,体式不同”,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赵翼曾说,“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列传以志人物”,这是“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而创制的“史家之极则”。(《廿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纪传体历千年而不衰,主要应归功于以人物记叙为中心的历史观。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帝王将相统统还原为人,因此,“传以志人”,仍可视为“史家之极则”。不过,随着人们的文化心理的不断变化,认知需求的不断更新,志人之传,不但要载言征实,惩恶扬善,而且还需要激扬情感,流连文思。虽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但都“志”在传人,“志”在传神。“时移世异”,毋叹今不如昔;“体式不同”,更须与时俱进。果欲载言征实,惩恶扬善,又可激扬情感,流连文思,其在“志”、“传”二义的推陈出新否?

参考文献:

- [1]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C]. 台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 [2] 修《晋书》诏[A]. 晋书(卷末)[Z],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 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 金明馆丛稿初编·述东晋王导之功业[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5] 刘知几. 史通通释[M]. 浦起龙通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6] 吕思勉. 史学四种·史通评[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7] 李培栋. 魏晋南北朝史缘·《晋书》研究[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 [8] 六朝小说与《晋书》之关系初探[A].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C]. 台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 [9] 何兆武.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Jin Shu Compiled in Tang Dynasty Drew Upon *Shi Shuo* : Its Merits & Demerits

WANG Lihua

(International Culture Exchange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at *Jin Shu* compiled in Tang Dynasty drew upon *Shi Shuo* has always been the target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criteria for its literary criticism are respectively based on two perspectives: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biographies. As far as the former is concerned, that *Jin Shu* compiled in Tang Dynasty drew upon *Shi Shuo* was something “well done” rather than something “done wrong”. But as far as the latter is concerned, it is something not “adequately done”, and “not well done”. The reasons lie in the following: too many “old events were compiled”, and too little “significance was drawn”; as a result, events are seen instead of people, history is written without biographies. While compiling a history, 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describe and narrate historical figures and their great spirit so as to render them alive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e event that *Jin Shu* compiled in Tang Dynasty drew upon *Shi Shuo* has left a great deal for us to refer to.

Key words: *Jin Shu* compiled in Tang Dynasty, *New expressions in Shishuo*, merits and demerits, two-fold principle, two-fold examination

(责任编辑:藏 峪)